

內地這座城市有一個較高規格的體育場，體育場附近有一個露天的標準化的田徑跑道。

每天晨曦初露，鍛煉身體的人們就三三兩兩從四面八方朝這裏聚集。有的是附近社區的居民，躊躇着就來了，有的住得較遠，要騎着自行車或摩托車趕來，更有甚者，要驅動寶馬、別克、大奔。

不要看跑道上的人，只消看一眼跑道場外所停放的各類型的交通工具，就知場內鍛煉的各色人等。

田徑跑道色彩鮮艷，分道線鮮明，順着跑道或跑或走，都不會發生擁擠碰撞事件。這些年提倡「逆行逆施」，在跑道上倒退着走，有線標示着，也不會「跑偏」，加上落地彈性好，腳感舒適，覓一個角落蹦跳跳跳、打武術練倒立的也各得其所。

孩子們早上要趕上學，青年人要趕上班或者夜生活太遲不能早起，前來鍛煉的以中老年人居多。

中老年人中，有的還在上班，有的已退休。由於不是什麼隆重場合，大都穿着隨便，講究點的是運動套裝，不講究的是過氣的舊衣服或是乾脆穿着睡衣就來了，當然也有穿着兒女不要的衣服，不協調的搭配着。

一邊走着跑着，一邊也聊天。東家長西家短，工作的煩惱、家庭的瑣碎，一說就是一早上，說着說着，就都突然明白了似的，停了下來，說：唉！鍛煉，鍛煉！

有什麼比身體健康更重要呢？看看那個讓老娘牽着手圍着跑道一步一步艱難抬腳的女子，才三十歲，突發腦溢血，孩子剛上幼稚園，發病的前一天，還因爲姑姑和媽媽誰帶孩子與丈夫爭吵，與小姑子爭吵。這一發病，孩子沒人帶了，還得騰出手照顧她。幸好沒有更嚴重的後果，家人都因此噤聲。

跑道外有一個五十多歲的男子，每天扶着樹扶着欄杆練走路，據說是因爲一彎腰撿東西，就偏癱了。老伴去年患尿毒症去世，錢花得溝裏河裏都乾了。兒女都在老遠的外地，不能丟了工作老陪他吧，就半月一來、一月一走地來看他，更多的時候是他自己在做康復鍛煉。看着他顫顫地一點一點地挪步，不認識的人都想上去扶他一把。

還有一對老年夫婦，都有八十多歲了，每天推着一輛輪椅前來，怕走得慢佔了人家的道，就在沒有跑道線的周邊轉圈。老人倆沒有腿疾，但都蹣跚着，於是老頭坐着老太推一圈，老太坐着老頭再推一圈。有幾日天氣陰冷，老人倆沒有來，鍛煉的人都提着心：是不是哪個先走了？也不敢問，直到天放晴，又見了那輛輪椅，才算落下來。

更讓人唏噓的是一對母子，兒子不到四十，提拔了個副縣，一高興就和朋友多喝了幾杯，言語不清、半身不遂了。每天老娘推他出來，也不爲鍛煉，只是透透氣，看看光景。那副縣流着口水，欲罷不能的樣子。看着不停地哄他、給他擦口水的老娘，人們都嘆氣。

來鍛煉的當官的也不少，但在這裏都沒有了會場上的精神和氣勢。寬鬆隨便的大襟褲，簡單舒適的套頭羊毛衫或夾克衫，說話雖然矜持着，但笑聲是隨和的。官場上歷練的人，其實看得更透，生命和身體重要還是權錢重要，比誰都清楚。可有時候是陷入了而不能自拔。話說前幾年有個官員，官場抑鬱，得了癌症，臨終前說的是如果有來生，他一定得辭職，過平常人的日子；還有另一個官員，因腐敗，判刑時哭得痛心疾首，也說的是如果有來生，他要回老家，當個農民，哪怕是天天吃紅薯。可這都是後話呀，當官的時候哪會有這種想法呢？哪知災難在敲門呢？

人哪，說一千道一萬，什麼最重要呢，生命和身體，健康的身體是一，權錢榮譽地位事業愛情等等都是後面的零，沒有那個一，後面再多的零又有什麼用呢？

說着說着，太陽就出來了，給桔紅色的跑道鍍上一層金光，人們收拾着搭在樹上欄杆上的衣服，三三兩兩分散而去，各類型的車也打道回府了。

## 冰雪運動

嚴 陽

數九寒天，滴水成冰，清華校園裏的一大一小兩個「荷塘」都已冰封。相對而言稍大一些的那個「荷塘」的冰面上，活躍着不少青少年。他們或坐冰車，或蹬冰鞋，瀟灑而愜意地在冰面上來回穿梭。看着他們，全身裹得嚴嚴實實，幾乎只露出一雙眼睛的妻子問我：「他們難道不冷嗎？」我笑笑，沒有回答。

我知道對於冰面上這些孩子來說，當然不會感到冷——運動會讓身體額外產生一定的熱量，不只可能感覺不到冷，而且心裏可能正熱乎着呢！就像五十年前，我家鄉那年冬天大冷，一些孩子下到河裏的冰面上跐溜一樣。僅僅是相對於眼下北京的這些年輕人的冰上運動，我們當年那種小步幅、慢節奏的跐溜，運動量要小很多；更多的也只是膽戰心驚，而很難說充分享受冰雪的樂趣。然而不管怎麼說，他們的心理卻是相同的，那就是他們都很喜歡冰上運動。之所以熱愛，是因爲運動本身就充滿趣味，而冰上運動的趣味又有些特別——充滿不確定性，也可以說意外，如各種滑倒甚至摔倒。

在冰面一旦摔倒，那感覺會是什麼樣，這並不難想像：冰面如鐵一樣堅硬；所以，即便是你全身的保護相當到位，那麼，摔得鼻尖發酸、手腳發麻恐怕是少不了的。因此，冰上運動也完全可說是以勇敢者的運動。

後來兩天，在紫竹院公園、後海等地方，我們看到了比之清華園裏更加浩大和熱鬧的場面。尤其是在後海宋慶齡故居前，我還看到了更多的花樣：在這裏依然有不少人坐冰車——這些人應該是初級冰上運動的熱愛者，尚未建立冰上滑行的平衡感，又對摔倒冰面之類缺乏足夠的心理準備；還有大量的年輕人在這裏滑冰——這些人無疑應該屬於中級以上冰上運動的熱愛者，是他們構成了這裏的主體。我還看到了七八個十來歲的小男孩，在顯然是他們的教練的中年人的指導之下，身着冰球服、手持冰球杆，在練習滑冰動作。還有一對夫妻，在玩花樣滑冰——雖然他們的動作難度與美感無法與花樣滑冰運動員相提並論。

最爲讓人驚嘆的則是，在這裏，我們看到了六七位年過半百的老年朋友在鑿開的冰窟窿裏冬泳！

事實上，人對冰雪存在着天然的感情——這當然是在解決了溫飽的前提下。十個孩子可能就有八九個喜歡打雪仗、堆雪人，喜歡拿着冰凌玩耍，就是證明。河面冰封，很多男孩子喜歡在冰面上擲物，看瓦片一類的東西在冰面上蹦跳跳跳、聆聽它們發出的唧唧聲響，也是證明。對於成年人來說，再玩這些東西無疑有些不調——與自己的年齡和身份不大相符，所以，他們只能選擇另外一些方式來表達自己對冰雪的感情。而在冰面上速滑或者是花樣滑冰或者是打冰球或者是滑雪之類，則是更加合適的方式。在這些運動中，人們一方面可以盡情地享受大自然的樂趣，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地展示自己的勇敢。

在中國，不同地域的人們的個性存在一定的差異。而北方之所以多勇者，我以爲應該與北方的生存環境或許相對南方相對要艱苦一些，尤其是在冬季，需要經受嚴寒的考驗，在冰天雪地的世界裏待上相當漫長的一段時間有一定的關係。所以，大力發展冰雪運動，可以培養孩子們堅毅的性格、無懼困難的勇氣，同時對塑造他們強健的體格是有積極意義的；也因此，國家花費一定的財力申辦冬季奧運會需要正視的問題或許在於，我們是不是也有屬於長期性質的冬奧戰略？我們能不能借助舉辦冬奧之機，爲老百姓創造更好的從事冰雪運動的條件？

## 卓別靈被迫流亡瑞士小鎮

高秋福



從洛桑出發，沿着萊蒙湖北岸向東行駛一刻鐘，車子戛然而停。下得車來，只見離湖水不遠的路邊豎立着一座顏色有點發烏的人物雕像。頭戴圓頂禮帽，上身裏着窄小的西服，下身套着寬鬆的長褲，左手斜搭在胸前，右手拄着一根似弓的竹節杖，一撇短髭掛在嘴角，歪斜的兩眼在狡黠地閃耀。通體一副滑稽的神態，令人不禁發笑。不用說，這就是鼎鼎大名的電影演員卓別靈（Charlie Chaplin，內地譯：查理·卓別林，一八八九年至一九七七年）了。

卓別靈的雕像何以豎立在此處？此處名叫沃維，是瑞士的一個既普通又普通的小镇。說普通，因爲面積不到二點四平方公里，人口只有一點八萬，像這樣規模的小镇，瑞士有很多。說不普通，因爲這裏早就名聲遠播。近點說，雀巢咖啡的總部設在這裏，這裏已成爲世界聞名的飲品中心之一。遠點說，這裏北近阿爾卑斯山的餘脈，南臨四季湛藍的萊蒙湖，青草遍野，綠樹滿坡，遠離塵囂，空氣清新，環境幽靜，早從十九世紀起，就成爲歐洲文人雅士追逐的「人間仙境」。俄羅斯的果戈理、陀思妥耶夫斯基，法國的盧梭、雨果，德國的歌德，英國的格蘭姆·格林，都會來這裏住下。卓別靈生在英國，夢在美國，美國夢破，流亡瑞士。他一生中的最後二十五年，都在沃維度過，最終又長眠沃維。沃維給卓別靈以極大的安慰，卓別靈則給沃維增添無限光彩。

卓別靈一八八九年四月出生在倫敦。父母皆爲雜耍演員，靠賣藝爲生，生活相當清貧。在他童稚時期，父母分居，他隨同母親生活，八歲就登台演出木屐舞劇。他十二歲那年，父親酗酒去世，母親罹患精神疾病，他和同母異父的哥哥被收容到少年感化院。年歲稍長，他同哥哥有時打雜工，有時在歌舞廳演員串。十七歲那年，時來運轉，他憑藉自己的表演天分，進入倫敦小有名氣的卡爾諾默劇團，擔任小丑演員。一九一二年十月，他隨同劇團到美國巡迴演出。美國是他久已嚮往的「自由之邦」，施展才華之地。幾個月演出下來，他所扮演的丑角引起人們的極大興趣。

翌年初，他再次到美國演出，被美國電影導演麥克·塞納特看中，留下來改演電影。從此，他的命運發生重大改變。起初，他按照導演的要求，在《流浪漢》、《淘金記》等一系列無聲影片中扮演來自社會底層的小人物，諸如乞丐、小偷、無家可歸的窮人、四處漂泊的移民。依靠雕像上那種滑稽的裝束，再配以誇張性的僵硬動作，他把那些人物既滑稽可笑又淒婉可親的性格刻畫得惟妙惟肖，令人總是含着淚花發笑。他以這種獨特的表演技巧，很快就贏得「喜劇電影明星」的稱譽。

可是，他很快就認識到，「將一塊奶油蛋糕飛擲到別人的臉上也許逗趣」，但難以真正打動觀眾，令他們回味和深思。於是，隨着經濟實力的積累，他着手建立自己的公司，嘗試獨立製片。他打破單純製造喜劇噱頭的做法，在影片中注入一定的社會政治內容。這在《城市之光》和《摩登時代》中已初露端倪。這兩部電影描繪城市貧民和工人的艱難生活，喜劇元素與現實情感相互交融，令人在發笑之餘傳達出一種政治資訊。一些敏感的影評家當即指出，卓別靈的電影開始塗抹上「反資本主義色彩」。一九四〇年，他拍攝《大獨裁者》，直言不諱地譏諷、嘲弄納粹頭子希特勒，批判其宣揚的「愛國民族主義」。隨後，他又拍攝《凡爾杜先生》，通過銀行小職員凡爾杜在世界性經濟危機中苦苦掙扎，譴責戰爭販子和軍火商人的「殺人英雄行爲」。美國政府認爲這是一部批判現實社會的「有害影片」，禁止在多個大城市放映。進步影評家們則認爲，卓別靈的電影作品從對下層勞動者寄予深切同情，到對上流社會的種種弊端進行辛辣譏諷，反映了他從一個普通的人道主義演藝人成長爲一位批



▲ 豎立在瑞士沃維的卓別靈雕像

作者供圖

判現實主義的藝術大師。

一九五二年九月，卓別靈新拍的電影《舞台生涯》在歐洲各國舉行首映式，他攜家人前往參加。輪船剛剛駛離紐約港，他就收聽到美國司法部發表的聲明，表示美國政府拒絕他再入境。其實，早在一九四七年，美國聯邦調查局就認爲他是「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」，開始對他進行調查。他的電影出現「政治異動」的苗頭，他提出在西歐開闢反法西斯第二戰場的呼籲，他同美國共產黨人士的密切交往，都被視爲「危險的信號」，有「共產主義嫌疑」。卓別靈抵達歐洲後堅決否認他的指摘。他表示，他信仰的是自由，只想把電影拍攝好。但是，無論他如何爲自己辯解，美國政府都不鬆口。

### 決心離開美國

卓別靈幾十年來對美國的期望與幻想至此全部破滅。他和美籍妻子烏娜商量，決定留居在瑞士。一九五三年初，烏娜代表他返回美國賣掉全部資產，把他的手稿、影片等珍貴資料運到瑞士。同時，烏娜宣布放棄美國籍，加入丈夫擁有的英國籍，決心再也不回美國。幾經尋找，他們在風景優美的沃維購買了一座名叫班府的宅邸，全家都搬遷進去。班府是一個面積十四公頃的大花園，林木鬱鬱蔥蔥，草坪碧綠如茵，花枝繁茂嫣紅。園子中央有一座修建於十九世紀的新古典式二層小樓，清幽典雅，設備齊全。就在這裏，卓別靈開始了一種全新的生活。

在旅居沃維的二十五年中，他主要做了三件事。一是繼續拍攝電影。其中，一九五七年拍攝的《紐約王》（又譯爲《一個國王在紐約》），假借一個國王在紐約的遭遇，無情地諷刺美國對堅持正義和進步的人士的迫害，不啻爲對猖獗一時的麥卡錫主義反共惡浪的一個有力回擊。二是整理或重新編輯昔日的一些影片。終其一生，卓別靈共拍攝長短影片八十多部。他對其中幾部或重新剪輯，或重新配樂，然後重新發行放映。三是撰寫了四十萬字的回憶錄《我的自傳》，還編了自己的畫傳，忠實地記錄了自己艱苦奮鬥的一生。

在沃維期間，有兩件截然不同的事令他激動和難忘。一是一九五四年夏天，他應邀出席了參加日內瓦會議的中國總理周恩來舉行的宴會。賓主雙方一邊品嘗茅臺酒和香酥鴨，一邊熱情交談。卓別靈回憶了一九三六年短暫訪問上海的經歷。周恩來向他介紹了中國的革命和建設情況，盛讚他在電影藝術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。正遭受政治迫害的卓別靈異常激動，當

即表演了他著名的「流浪漢舞步」。此事報道出去，他的「親共」嫌疑再次遭到美國媒體的炒作。二二是他的影片在美國得到重新評價。一九六〇年前後，美國國內的政治空氣緩和下來，卓別靈的一些電影獲准重新放映。一九七二年，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發出邀請，懇請他回美國接受一項榮譽獎。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四八年，他已五次從這個機構獲獎。因此，對他來說，得獎本不是什麼新鮮事。但是，這次獲獎與以往不同，獎勵的不是他的某部電影，而是授予他一種特別獎項，對他作為演員兼導演、編劇、製作人、音樂人作出全面的肯定。更重要的是，這次獲獎說明，在橫濱地驅逐他整整二十年之後，美國開始對他作出新的評價，他終於贏得一場道義之戰。因此，他毫不猶豫，決定應邀前往。在隆重的頒獎儀式上，他被稱頌「使通俗娛樂上升爲典雅藝術」，「爲本世紀的電影藝術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」。與會者全體起立，鼓掌歡呼長達十二分鐘。年屆八十三歲高齡的卓別靈笑了，笑得很開心。

### 名字無處不在

晚年的卓別靈曾幾次中風，再也不能在美麗如畫的沃維海濱自由散步，只能坐在輪椅上由妻子推着在自家的花園中蹣跚。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平安夜，他同親友歡聚，席間喝了一點酒。上床後，他久久不能入眠，就服用幾片安眠藥。次日凌晨，家人發現他竟「一覺不醒」。檢查證實，他是酒後突發中風，與世長辭，終年八十八歲。隨後，他被安葬在沃維近郊的科西埃公墓。豈料，兩個多月之後的一九七八年三月一日，他的墓地遭盜掘，棺槨和遺骸不翼而飛。瑞士警方當即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搜查。五月十七日，罪犯被抓獲歸案。原來，兩個來自波蘭和保加利亞的移民，長期失業，生活無着，就在卓別靈這位世界名人身上打主意。他們趁夜深人靜，把他的棺槨從墓穴中挖出，本期望得到一些「富人殉葬的財寶」，結果卻一無所獲。隨後，他們打電話給逝者的遺屬，索要三十三萬英鎊的贖金。烏娜堅決拒絕說：「我丈夫活在我的心裏，他的遺體在哪裏並無關緊要。」盜墓者的勒索企圖沒有得逞，反暴露了自己的行跡，隨即被警方抓獲。幸運的是，棺槨和遺骸被盜劫到一塊玉米地，竟完好無損。

經慎重考慮，卓別靈的遺骸仍安葬在科西埃公墓。爲防止再次被盜，棺槨深埋後又覆蓋上厚達六英尺的混凝土。現在，我們看到，在綠草青蔥的墓地上，只簡單豎立起一塊方形的灰色石碑，上面沒有任何雕飾，只是鐫刻着他的姓名和生卒年份。同他的墓地並排的，是十四年後去世的夫人烏娜。烏娜是美國著名劇作家尤金·奧尼爾的女兒，比卓別靈小三十六歲。一九四三年六月，她作爲一個十八歲的妙齡少女，堅持要嫁給五十四歲、結婚三次的卓別靈。此事遭到父親的反對，導致父女二人失和。但是，她從不後悔，熱心陪伴卓別靈度過後半生，生育有八個子女，成爲「難得的幸福的一對」。因此，人們非常尊重她，認爲她是一位極有見識的女性。她的墓前同卓別靈一樣，鮮花總是終年不斷。

踏着鵝卵石鋪就的人行道，徜徉在沃維迷人的街巷，可以看到卓別靈的名字無處不在：一個公園以他的名字命名，兩幢大樓上鐫刻着他那令人笑口常開的形象，街頭小攤展售着精心仿製的他的手杖。回到萊蒙湖邊，再度審視他那座雕像，我忽然發覺以前彷彿在哪裏見到過。是的，在其故鄉倫敦的萊斯特廣場上，就有英國當代著名銅雕藝術家約翰·道布爾戴製作的一座完全相同的雕像。向附近休憩的當地人求證，得悉這裏的雕像原是倫敦那座雕像的複製品。兩座雕像，就這樣把長眠異鄉的卓別靈同其故國緊緊地連結在一起。

這位從英國默劇團走出來，在娛樂界勞動七十多年的天才藝術家，已成爲全世界尊崇的文化偶像。

## 走進佛洛伊德故居

葉 周



在維也納市區中有不少名人故居，在阿爾瑟格倫德區，我順着街走進居民區，街道並不寬闊，兩邊的民居顯然有些年頭了，四五層高，一幢連着一幢，之間都沒有間隙。穿過厚重的門，登上寬敞而彎曲的樓梯，來到三樓，我輕輕敲着兩扇紫色的木門，那就是心理學大師佛洛伊德（Sigmund Freud，或譯：弗洛伊德，一八五六年至一九三九年）的住處。居室並不奢華，也不寬敞，現在已是佛洛伊德博物館。佛洛伊德自一八九一年起，在那裏工作和生活四十七年之久，當時那裏既然是他的心理診所同時也是住所，他在那裏完成了大部分著作。一九三三年納粹執政後迫害猶太人，他們在柏林公開燒毀佛洛伊德的著作，佛洛伊德的所有著作都被禁止出版。佛洛伊德在一九三八年維也納被佔領後仍不願離開，最後由於女兒安娜被捕，房屋又屢遭納粹匪徒搶劫，他才同意去倫敦。佛洛伊德的病人和朋友、拿破崙家族的瑪麗、波拿巴公主花了一大筆錢，把佛洛伊德一家從納粹黨手上贖出來。一九三八年六月四日，佛洛伊德經法國巴黎去到英國倫敦。

當時佛洛伊德住的街區，左鄰右舍大多是猶太人。我站在那條寧靜的街道上忽然想起看過的波蘭電影《鋼琴戰曲》（The Pianist，內地譯爲《鋼琴師》），其中的畫面淋漓盡致地表現了納粹迫害猶太人的血腥和殘酷。

走進故居的門廳，放着一張沙發供病人候診。他的工作室中，辦公桌後的窗架上掛着一面極普通的長方形鏡子。展出的歷史照片中有一幅當年佛洛伊德在同一窗前工作的照片，他的身後就掛着同樣的鏡子。他的坐姿很有個人特色，閱讀和工作時，他喜歡側着身子斜躺在椅子上，因此他坐的椅子是請人按照他的要求特製的。他瘦長的面容總是顯得異常嚴肅，目光機警地注視着前方。他應該是一個緊張的人，每天要抽一盒雪茄。

佛洛伊德出版的著作《夢的解析》和《圖騰與禁忌》通過對人類各種極端心理情緒的研究，發布了獨具